

俄羅斯漢學現代化之父 ——格奧吉耶夫斯基中國觀及其歷史貢獻

The Father of Modern Russian Sinology:
Sergei Georgievskii's Views on China and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張志遠 (Zhang Zhiyuan) *

—

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格奧吉耶夫斯基 (Sergei Georgievskii)，1851 年出生於俄羅斯庫斯特羅姆省一個神父家庭，從小便受到其父的薰陶。1861 年進入庫斯特羅姆當地中學讀書，並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遂於 1868 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深造，獲得候補博士學位。畢業之後出任俄語與歷史教師二年，1875 年來到俄羅斯東方學教育中心——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就讀，師從於 19 世紀下半期俄羅斯漢學領軍人物瓦西里耶夫。1880 年畢業之後，雖未能如其所願進入職位有限的政府部門，但毅然投身於待遇豐厚的商業公司，進入到了莫斯科一家專營茶葉的貿易公司。因業務關係，他被派往中國，1882 年回國，期間他遊遍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和福州等地。次年，出於對漢學的喜愛及其恩師瓦西里耶夫教授的先前教誨，格奧吉耶夫斯基放棄了漢語翻譯的工作，再次進入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1885 年，格奧吉耶夫斯基完成並通過了題為《先秦史》的碩士學

位論文，並留校任教。時任論文評閱人的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茲涅耶夫給予其高度評價：「格奧吉耶夫斯基的論文足以證明，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本國的學者在論述中國古代歷史的時候，都不是完全可以確信的，必須找到確實的考古資料才能令人信服。」¹ 1889 年，他完成了博士學位寫作，題為《反映中國古代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研究》。² 1890 年格奧吉耶夫斯基被聘為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的教授。1893 年，他出國收集研究材料，遍訪倫敦、巴黎和柏林各大圖書館，在歸國途中，不幸因病逝於法國，年僅 42 歲。

格奧吉耶夫斯基生命雖然短暫，但是卻為俄羅斯漢學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留世漢學著作多部且影響頗巨。

格奧吉耶夫斯基的《先秦史》³ 是俄羅斯漢學史上第一部專門研究秦以前中國歷史的學術力作，為世界漢學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世界漢學史上同樣也佔有突出的歷史地位。該書 1885 在聖彼得堡出版，是在其碩士論文的基礎之上加以整理而成。該書在前人研究的

* 作者為東北師範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1 Хохлов, А.Н.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китаеведа М.Георгиевского //Пятнадцат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1994.

2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Анализ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цев как отражающей в себе историю жизн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Пб.,1888.

3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До императора Цинь-ши-хуан-ди*. СПб., 1885.

基礎之上，將俄羅斯中國古代史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全書共計六章，以時間為軸，以國家事務為主線，系統地敘述了從原始人至周朝、周朝至春秋、春秋至戰國、戰國至秦統一的歷史，除外還對中國古代文獻特點和歐洲漢學家中國觀以及秦帝國統一中國歷史條件一併加以敘述。此書一經出版，便受到強烈的反響，批判與贊許紛至沓來。究其原因，不外乎該書一反常態旗幟鮮明地對時下盛行於歐洲史壇的歐洲中心論的加以否定，從而奠定了格奧吉耶夫斯基中國古史研究的基本論調，即：注重中華文明自身文化的獨特性，論證須以考古發掘材料為依據，方使其結論更加充分有力。

《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與觀念》⁴於1888年聖彼得堡出版，全書分為12章，分別敘述了靈魂不滅、祖先崇拜、祠堂、婚姻、家族、嫡長子制、家長制、多神教的發展等觀念，特別強調儒學對中國人生活與觀念的影響，並加以著墨，以五章篇幅論述儒學與孔子以及儒家學說精髓。從書中不難看出格奧吉耶夫斯基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國的靈魂不滅、祖先祭祀、長幼有序、多神宗教、儒家學說等中國文化和現象上。該書一經出版影響巨大，堪稱俄羅斯研究中國古代祖先崇拜的最佳著述。

《中國人的神話觀與神話》⁵出版於1892年。該書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部敘述中國神話的著述，他也為此成為國家漢學界從事該項研究的先驅。該書以《尚書》、《詩經》、《禮記》、《搜神記》、《文獻通考》等中國古代經典文獻為基礎，加以整理，研究了中國人的神話觀以及演變過程，相繼介紹了混沌開闢、陰陽理論、五行等觀念。書中提出的很多觀點至今仍有價值。該書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部中國神話專著，其同樣也成為了國家漢學界從事這個領域研究不可逾越的藩籬。

《研究中國的重要性》⁶是格奧吉耶夫斯基漢學研究的巔峰著述，也是俄羅斯第一部中西文化比較的巨著。於1890年出版，全書包括前言、結語、附錄和12個章節。該書推陳出新，緊緊抓住當時歐洲盛行用以專指

「落後、停頓、保守」的中國的陳腐觀念加以展開論述，並對這種無端對中國的曲解和謬誤進行剖析和駁斥，不乏西方歷史哲學家黑格爾和康得觀點，並對中華帝國的歷史加以重新審視。格奧吉耶夫斯基為當下漢學發展指明了方向，對漢學研究本身而言，使其構建起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漢學。此外，格奧吉耶夫斯基還專心於漢語研究，撰寫了《對反映中國人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漢語字根構成以及中國人的起源》。限於篇幅，在此不加贅述。

二

中華文明發展獨特性這一重大歷史課題的提出並非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的出現與歐洲歷史思想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就其作用本身而言，反映了東西方兩種觀念的對立和衝突。在西方史學框架的世界史是以西方文明歷史進程為樣板，完全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歷史敘述。很顯然，這並未充分考慮到非西方文明歷史發展道路的獨特性，這一「不對稱」長期存在於20世紀前乃至當下史學。這就引發了一系列對非西方文明獨特性這一歷史課題加以界定和深入剖析。就19世紀中葉歐洲東方學而言，東方學研究方法的核心問題之一，多是以上訴所謂歐洲的經驗為出發點，對東方文明的歷史發展模式以及歷史進程加以曲解。此等觀點顯然是閉門造車，與時下史學更顯得不合時宜，漢學現代化和科學化已刻不容緩。

19世紀中葉，在俄羅斯和歐洲漢學的現代化、科學化應運而生，其中最早給予漢學科學定位以及對中華文明發展獨特性給予詳實論述的學者當屬俄羅斯漢學大師格奧吉耶夫斯基。其建樹不僅僅表現於前者的著述方面，在理論創建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其對俄羅斯漢學研究影響最為深淵的便是，他制定並且試圖解決了

4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СПб., 1888.

5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Пб., 1892.

6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Пб., 1890.

中華文明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關鍵問題。首先，明確提出中華文明發展獨一無二的，且其歷史文化發展規律隸屬於全人類的觀點；其次，格氏提出了漢學研究應當擁有明確的目標性和方向性；再次，格氏在研究方法上，多採用分類法和歸納法。以上三點，對於遠未實現專業化，基本上處於翻譯、描述、語言分析的 19 世紀俄羅斯漢學研究而言，格奧吉耶夫斯基很顯然成爲了當下俄羅斯乃至世界漢學研究的翹楚。

要對格奧吉耶夫斯基歷史觀重要性進行充分的評估，就不得不考慮其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即：傳統歷史觀念對格氏的研究視角和「中國歷史之夢」的影響。首先，作爲 19 世紀歷史範式之一，即：人類歷史進程被認爲是從低級到高級的演進發展模式，它反映了人類生活的改善和理想的實現。很顯然，這都是以歐洲爲中心作爲評介歷史進程的基準。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其他的民族則被排除於世界歷史進程之外，只能作爲民族志材料的形式得以存在。以中國爲例，作爲可持續發展的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任何形式的演變都被視爲是毫無意義的。最終導致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盛行著用以專指「落後」、「停滯」的「中國形態」概念加以展開論述。⁷ 中國的歷史進程被劃歸爲人類歷史發展的最低階段，例如：德國歷史哲學家黑格爾《歷史哲學》。與此針鋒相對，格奧吉耶夫斯基打破了這種以歐洲中心論爲基礎陳腐觀念，提出中華文明具有其特殊性的歷史論斷，即中華文明是一種開放的，不斷進步、發展的、拓展性的文明；現代漢學最重要的任務便是，賦予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華文明本該具有的文化特質。

「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包括治學方法、學術觀點、歷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歷史的產物。任何史學家在治史過程中總是離不開自己所處時

代的影響，同時也離不開史學學科發展狀態的影響」。⁸ 格氏之所以能對近代歐洲中心論以及以此爲支撐的歐洲歷史研究模式給予清醒的認識。究其原因，就在於其深受俄羅斯傳統哲學和社會思想的薰陶。在世界歷史背景下，俄羅斯民族歷史身份認同問題，即：其屬於東方還是西方的歷史性大討論爲俄羅斯知識界廣泛關注，並對自身歷史進程的全貌得到了清晰的認識。以此爲基礎，作爲俄羅斯民族判斷自身在世界歷史定位和民族自我認同的依據。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影響到俄羅斯知識界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俄羅斯東方學研究和歷史學理論問題的分析。整個俄羅斯學術界瀰漫在東方學的氛圍之中，掀起了一股對東方重新審視的熱潮。例如：霍梅科夫《七部分》、⁹ 丹尼列夫斯基《俄羅斯與歐洲》、¹⁰ 索洛維約夫《中國與歐洲》¹¹ 都是這一時代特徵的反應。在此背景下，格奧吉耶夫斯基以此爲契機，對俄羅斯漢學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創建，如：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中華文明地位、特點以及形成原因加以論述，並對中國與歐洲歷史進程加以比較。

格奧吉耶夫斯基對歷史進程的解讀深受俄羅斯著名學者卡列耶夫《歷史哲學問題》¹² 的影響。在卡列耶夫看來，歷史進程是一種有機環境（文化和社會形態）和個體活動的互動。進步因素是不斷發展的，其與人類的實踐能力是相適應的。兩者可以將有機環境轉換爲人類最理想的社會。根據以上對歷史進程的理解，格奧吉耶夫斯基提出兩項具體的目標：其一，透徹研究古典中國社會文化的演變，並在此框架內撰寫了兩部代表著作，《先秦史》、《對反映中國人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專門敘述了遠古時代到西元三世紀前的中國歷史，首次嘗試以大事件爲敘事中心，擺脫過去對中國歷史進行簡單描述的編年史敘述。以此爲標誌，揭示著漢學研究中

7 閻國棟，《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105。

8 吳於廑，〈世界史前景雜說〉，原載於《內蒙古大學學報（哲社版）》1985 年第 4 期，本文引自《吳於廑學術論著自選集》，頁 30。

9 Хомяков А.С. Семирамида //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94. Т. 1.

10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Пб., 1995.

11 Соловьев В.С.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 Соловьев В.С.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Ростов н/Д, 1998.

12 Кареев Н.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М., 1883. Т. 1-2.

國古代政治史的興起。在考慮到考古研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格奧吉耶夫斯基以文化生活為切入點，運用古代漢語、象形文字和古漢語文學等為敘述摹本，仔細研究了中國古代生活情況以及對現實的感知認識作為文化生活史研究的方式。最後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中國雖然以穩定的狀態出現，但是它絕不缺乏進步，他完全不是停滯狀態的代表。其二，分析中國持續進步的原因，指出：「通過個體的演變實現人類美好的藍圖，更好適應其對文化需求。」¹³ 在解釋穩定性原因的同時，格奧吉耶夫斯基對了中國進步本質問題的給予解決，並完成了兩部代表著作，《研究中國的重要性》、《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與觀念》。

在《研究中國的重要性》中，格奧吉耶夫斯基著重強調了東周對於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性，稱其為「關鍵時期」。通過對中國古代不同流派思想的分析，格奧吉耶夫斯基提出孔子學說及其思想將成為中華文明具有持續生命力的源泉。儒家所宣導的生活習慣與觀念，並非一成不變的，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相適應的。在格奧吉耶夫斯基看來，作為中國古老文化的外部表現形式，儒學是在繼承了古老的中國文化，諸如原有祖先崇拜等傳統觀念的基礎上，並添入了更具普遍性新的道德標準，以滿足更高階層的精神需求。但是這些新道德標準多是對諸如尊重父母等一些舊觀念重新思考。對於後世子孫而言，這些道德標準得到了進一步深刻的認識，並相繼傳承了下來。此外，格奧吉耶夫斯基進一步闡釋了儒家學說對於中華文明的意義。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分析，格奧吉耶夫斯基採納了卡列耶夫的觀點，即：儒家學說雖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理想主義，但是其對於社會進步還是具有相當的推動性。以此為基礎，格奧吉耶夫斯基認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儒教給予了其學說清晰而多角度的闡釋，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準則……乃至對於當代中國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演變本身就

反應了中國歷史的進步以及中華民族的自我完善。」¹⁴

通過對中國和歐洲歷史進程的比較，格奧吉耶夫斯基提出了以下中華文明的特點：

第一，與西方相比，中華文明社會與文化演變是一致的，漸進的，延續的。

第二，在西方，社會進步的不同階段，是以不同的思想作為支撐的。而中華文明則不然。一方面，儒家思想對於古老中國生活習慣的影響具有一如既往的連續性；另一方面，隨著儒家思想被中國人在社會各個領域一致認同，這種思想也將被逐步的付諸於實踐。中國人生活狀態並不會像西方人一樣，跳躍性的從一種模式變成另一種模式。究其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在社會實踐中是穩健的、漸進的實現自己的理想，而不是追尋多元化。

總而言之，格奧吉耶夫斯基中國歷史觀是建立在世界不同區域歷史進程一致性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這種一致性並不是將不同區域的文化設想在一個古老文化被先進文化所代替的歷史模態之下，而是每一種文化都有自身的獨立發展的空間，並保有自身連續性。與此相適應，格奧吉耶夫斯基也認同文明強制性萎蕩與死亡也是存在的。很顯然，這一觀點受到了丹尼列夫斯基區域文明論的影響。在格奧吉耶夫斯基看來，古老的中國文化不可能成為其繼續發展的障礙，對古老文化的繼承也正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應當指出的是，通過對中華文明社會文化演變的分析，格奧吉耶夫斯基產生了對中國模式理想化的傾向，這一特點在其所處的時代尤為明顯。有一些研究者在摒棄歐洲中心論觀念之後，同時也產生了中國中心論的傾向。¹⁵ 出於上訴考慮，格奧吉耶夫斯基並未作出中國絕對獨特性的結論。而是在揭示了中國發展獨特性的同時，並以此為前提，做出了中華文明發展史隸屬於全人類歷史文化模式的結論，從而避免了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局端。

13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1890. с.195.

14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 187.

15 Кравцова М.Е.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я*. СПб., 2003. с.23.

三

格奧吉耶夫斯基在俄羅斯漢學史上做出了突出的歷史貢獻。在其短暫的一生之中，除數部漢學專著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格奧吉耶夫斯基為正處低谷的俄羅斯古典漢學指明了正確方向，即：現代化、學科化，從而構建起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帝俄漢學，其功不可沒。

首先，格奧吉耶夫斯基對俄羅斯漢學的學科發展方向以及研究目的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

19世紀中葉前，俄羅斯漢學處於古典漢學時期。就其特點而言，具有典型的民族化特徵：首先，改變了機械翻譯的研究方法，而代之漢學家按照俄國社會和讀者的需要編譯中國文獻；其次，俄國漢學達到了與西方漢學相當的發展水準，與國際漢學界有了平等對話和交流。¹⁶ 而到了19世紀中葉，處於編譯階段的俄羅斯漢學已經再也無法與俄羅斯社會需求相適應，漢學研究迎來了其發展的低潮期。格奧吉耶夫斯基通過對歐洲乃至俄羅斯漢學冷靜的思考，提出漢學研究應適應社會發展的新需求，幫助公眾建立起新的中國觀，即：對中華文明給予重新審視。在格奧吉耶夫斯基看來，「無論是俄羅斯還是歐洲漢學，都不能與其世代相適應。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由於缺乏成熟、穩定的研究方法，科學化的漢學是不存在的；漢學不應在被認定為是一門科學，而應當將其看成是多種學科的綜合。」¹⁷ 格奧吉耶夫斯基為俄羅斯漢學發展指明了正確的發展之路，到19世紀末

20世紀初，俄羅斯學術界構建起了具有真正意義的現代漢學。

其次，格奧吉耶夫斯基對盛行於俄羅斯和歐洲漢學中的歐洲中心論給予堅決的批判。

作為近代政治哲學一種解讀模式和基督教末世論的一種變體，歐洲中心論是將歐洲視為世界的中心，人類教育和啓蒙的源泉以及人類最大成就的基本所在的學說。簡單地說，這種觀點就是認為歐洲具有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特殊性和優越性，它是依靠這種內在力量興起並以自身為中心組建了一個世界。這種狹隘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導致人們對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瞭解，也不能正確認識西方，最終使人們不能正確認識整個世界和世界歷史。因此，長期以來，學術界針對這種觀點展開了深刻的批判。顯然，這是一元論觀點，其忽視了獨特文明、局部文化之間的本質區別；並沒有發現社會文化具有自身的獨特性。¹⁸ 格奧吉耶夫斯基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這種錯誤觀念提出了質疑，並予以明確的否定。從世界歷史統一模式的歐洲中心論泥潭中走了出來，轉向多元文化模式，從而確立了世界是多元的，存在於不同的社會空間之內。可以這樣說，與歐洲中心論的觀點相比，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分析方法，這是將文化普遍性介入到漢學研究領域，並使其成為漢學研究的一種常態。可以這樣說，在此之後的俄羅斯漢學現代化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春天。

16 閻國棟，〈俄國漢學若干問題芻議〉，《南開學報（哲社版）》，2006.4（2006.7）：74-81。

17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 8.

18 Панарин А.С. *Глобаль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е*. М, 2000. С. 20.